

基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个案的“一刀切”现象论析

张昭国¹ 魏春英²

(1. 华东交通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一刀切”现象,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典型一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一刀切”貌似公平、公正,但由于忽视差别,带来的遗留问题不容忽视。究其深层原因,一是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压力;二是简单划线,先验定性的线性思维和极性思维的简单化机械化思维方式;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即不管实际情况,不顾群众利益,只对上级负责。克服“一刀切”现象,必须加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

【关键词】农业学大寨运动 “一刀切”;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C93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1)06-0015-04

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一刀切”现象。如解放初期土改运动中对地主、富农阶级成分的划分;人民公社建立时的一哄而起;改革开放后干部任职年龄的规定;代课老师的清退等,无一不是这一现象的注脚。这种“一刀切”的执行方式,严重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扭曲了政策预期的公平或者效率目标,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本文拟以农业学大寨运动为考察对象,对此运动中的“一刀切”进行分析,以期今后减少甚至避免此种现象有所裨益。

—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很多地方主要以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为主,普遍存在照抄照搬的“一刀切”现象。例如山西晋中地委提出“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光说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而不学大寨的具体办法,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推广大寨经验不能掺假、不能‘走样’”^[1]。1980年,山西向中央的报告中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之一就是,“不但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还要学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在推行过程中又强调‘一整

套’、‘一本经’在方法上又搞‘一刀切’”^{[2]187}。

其实类似现象不唯山西,在全国亦普遍存在。大寨在1963年水灾之后取消了自留地,很多地方无视“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2]738}的国家规定,也如大寨一样,限制甚至取消自留地。江西省2/3的自留地被收回^{[3]133}。吉林省人均占有自留地面积1965年为0.48亩,1976年不足0.2亩^{[4]154}。大寨所在的昔阳县,1968年到1970年,把全县到阳泉等地搞运输等副业的几千名劳力、几百辆马车收回社队,并向全国介绍了其“车马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经验后,很多地方也把外出从事这些技术性的农民冠以“副业单干”之名,进行限制或批判。无锡县1972年从上到下开展了“人多田少要不要坚持以粮为纲,八分地上能不能多做贡献”的大讨论,大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破“只要钱,不顾线”的资本主义倾向,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劳动力盲目外流^{[5]31}。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学大寨简直是亦步亦趋。安徽芜湖县易太公社党委负责人,1974年到大寨参观学习归来后,按照所谓田园化要求重新划分生产队……打破原来生产队的体制和土地界限,打乱水系,对原来集体的粮、款、物、牲畜等重新进行平均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求做到土地、人口、村庄大小和水利兴修“四个一样”^{[6]154}。1973年,延安宜君县组织社队干部去大寨参观学习,见大寨村里有个“胜

【收稿日期】2011-04-27

【作者简介】张昭国(1972-)男,山东济宁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

魏春英(1976-)女,山东济宁人,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图书馆馆员。

天洞”回来后便照猫画虎,硬要哭泉公社沿泥河大队坡底生产队在咸阳通榆林的公路边也修一个“胜天洞”。为了在一条夹槽沟上修这么一个洞,从全公社抽调劳动力,从1974年到1976年,干了三个冬春,修成了200米长的一个石洞,洞上填土造地12亩。但由于洞身太小,雨季洪水下来,一下子被乱石泥沙堵满,洪水便从洞上奔涌,新造的12亩地和原来沟两旁的好地都被洪水冲毁,庄稼也被冲光。大寨搞“人造平原”的风吹遍全国后,连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被誉为“高原星火”的陕北米脂县高西沟大队,也在毁掉高标准的沟地去搞“人造小平原”^{[7]155-156}。于是,全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寨人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梯田变成平原,而很多地方,也几乎花费同样大的力气,把平原堆成了梯田。

不可否认,这时关于如何学大寨并不乏真知灼见。如1966年4月《大众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先进的学问》的短评。文章强调在学的时候,要肯于动脑筋、想问题,学那些适合自己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是学形式,学皮毛^[8]。陈永贵也一再提出了如何对待大寨典型的问题。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陈永贵强调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照搬照套^{[9]153}。1973年10月,在甘肃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他又针对外地学大寨盲目地搞大队核算和硬性强调收回自留地问题进行了批评。可惜的是,陈永贵的这些批评与建议并没有引起各地的注意,很多地方在学大寨时,还是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强调学大寨不走样。不仅如此,代之而起的是“全方位”的观察大寨、学习大寨。工业、商业、金融、交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司法、公安、青年、民兵、妇女、广播、气象、图书发行、档案等工作,都总结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在那里召开全国或全省、全地区推广其经验的现场会,大寨的具体经验也被作为普遍经验向全国推广。

二

究其学习运动中出现“一刀切”的原因,无疑“文革”中巨大的阶级斗争压力是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学不学大寨,怎么学,都是政治问题。但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与长期阶级斗争影响下,广大民众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中所形成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有关。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的地位日益凸显。随着反右、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斗争的升级,

至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对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强调“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年青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0]1249-1251}1963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的“五反”运动和随后全国统一的“大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

可见,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搞好“阶级斗争”的关键就在一个“斗”字。在此观念下,往往将矛盾等同于对抗,只见对立面不见统一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形成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机械化倾向。这种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单纯强调对立面的对抗态势,习于“敌与我”、“红与黑”、“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势不两立的敌我对抗套式,困于“无与资”(两个阶级)、“社与资”(两条道路)、“马与修”(两条路线)不可调和的斗争格局,耽于简单划线、无限上纲、先验定性的线性思维和极性思维,囿于“公与私”、“义与利”、“群与己”(群体与个体)绝对排斥的二值逻辑。这种思维方式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失去了辩证联系和活生生发展的简单化世界。在这个被主观图解化了的世界中,事物的发展只呈现出两个极点,非好即坏,不存在什么中间状态。

这种“脸谱化”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中国尤其是民间有一定历史。如“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谱以赭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梁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状态。……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11]57}但是把生活中、戏剧中的“脸谱化”溶进政治、进而形成思维定势的,尤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20世纪60-70年代最为典型。例如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中

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状态人物”的问题。他提出“创造英雄人物形象是不是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写英雄人物只写他完美无缺……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完全表现^[12]。显然，邵荃麟提出写中间状态的人物，目的是为了开拓更宽广的创作道路，使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更丰富，更多样化。但是1964年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后，《文艺报》首先发难，批判“大连会议”和邵荃麟。他的一系列主张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多样化，它只能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绝路上去。”这种“中间人物”不能存在的思维，使我们创作的电影等艺术作品，凡是英雄人物的扮演者也一定是英俊潇洒，一定是“高、大、全”，反面人物一定是贼眉鼠目。“文革”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八亿人民也只能在八个样板戏中“享受”艺术。在这种思维的逻辑下，至于学大寨，搞“一刀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

我们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都把工作方法问题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加以强调。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中，他又科学地概括了领导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为了克服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的危害，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从根本上提高领导水平，毛泽东又专门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文献。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也十分关注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他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多篇重要论著中，为清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毒，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恢复优良作风，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两条最根本的原则，并将其作为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后，“一刀切”的工作方法一再出现，其根源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缺乏辩证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客观物质世界既是统一的，同时又是多样的，与此相适应，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就不能简单化，不能

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剪裁生活，我们既要看到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又要看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但是，有些人在看待问题时，一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用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为了把事物区别开来，他们总是企图找到一条把不同事物完全分割并绝对对立起来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考与认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13]360}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的工作中，就做不到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刀切”就再所难免。二是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不能把握事物的特殊本质，找到事物变化的规律和条件，从而也就不能根据不同质的矛盾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法，也就只能无视地区与地区、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一事与他事之间实际存在的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情况，干什么工作都搞一个标准、一刀切。

对于“一刀切”现象的存在，诸多学者联系实际，撰文呼吁要避免其出现，他们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切忌一刀切”；“清退代课老师不能一刀切”；“一刀切的思维方式必须变革”等。可见，对于“一刀切”存在的弊端，我们逐步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杜绝“一刀切”现象呢？首先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对思维科学的学习研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科学思维素质，为观察分析和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维“钥匙”。只有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习惯做法中解放出来，从旧工业化时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才能创造性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从而避免一味的照抄照搬。其次，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建设。“一刀切”其实是党性不纯在工作中的表现，因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硬拿着一把刀剪切出整齐划一的一个实践模式，若切好了，可立功受奖，甚至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若切不好，则可上推下卸，至多做个工作不深入的检查，而无损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只有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才能够使他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反映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正确分析矛盾，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而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次，实际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科学地层层试点。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制订正

确的方针和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党正是运用这一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转化为我国的具体实践。1960年前后,面对着一窝蜂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调查研究,改变了把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的指示,作出了政策调整,使取消食堂不再成为政治问题。同时,试点方法是医治“一刀切”的特效剂。试点是一般和个别的纽带,它既以一般为指导,又是个别中的典型,集中包含着个别的具体性、直接性。中国各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在一个地方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不一定完全适合其他地方。只有经过不同层次性的试点,才能了解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到因地制宜。1958年人民公社兴办时,虽然后来是一哄而起,但最初毛泽东还是清醒地提出来“要试,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历史的悲剧就在于热情冲昏了理智,全国一刀切的办大社,越大越公越好。今天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正因为有了层层试点,所以才强调形式多样,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巨大飞跃。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就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很可贵的贡献。”^{[14][24]}这里,邓小平

着重强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在新时期,要使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要使党永远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的改变,避免产生形式主义的“一刀切。”

[参考文献]

- [1] 大胆解放思想,加速发展农业——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谈指导农业学大寨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1978-11-26.
- [2] 黄道霞.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3] 周太和.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 [5] 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中)[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5.
- [6]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之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7]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 [8] 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N].人民日报,1966-04-28.
- [9] 阜阳专区革委会办事组翻印.安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汇集[G].1970-10.
- [1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 [12] “中间人物”和典型问题——驳邵荃麟同志“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N].人民日报,1965-02-2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mposing Uniformity Based on the Campaign of Learning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

Zhang Zhaoguo¹, Wei Chunying²

(1.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ill now, there have been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a lot of cases in which uniformity is imposed forcefully, and the campaign of learning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 is one case in point. As a resolution imposing uniformity seems fair and just, but the problems it caus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such an activity,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stress from class struggles and struggles involving political lines etc. To avoid committing the same mistake,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some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leaders' party spirit, adhering to the world outlook of dialectic materialism, valuing objective laws etc.

[Key words] the Campaign of Learning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 imposing uniformity; working method